

海外华人族群文化与海外华文教育*

□ 李明欢 黄猷

摘要:海外华人族群文化导源于中华文化,就其原始形态而言,中华文化是源,海外华人文化是流。就其母国中国而言,随着其对国际社会与国际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全面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弘扬中华文化来发展软实力是一回事,支持海外华人文化从中华文化的母胎脱体而出、成为当地社会的族群文化又是一回事。由中国国家汉办倡导的面向各国民众的汉语国际推广,与海外华人为弘扬本族群文化而主导的面向华裔子女的文教教育,二者之间各有侧重,既不应混淆,亦不可相互替代。

关键词:汉语国际推广;海外华人;族群文化;华文教育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11-0108-06

“海外华人族群文化”是研究当代中华文化要素、特点与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人移民海外,源远流长。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走向世界各地,并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立足、立业、发展,与之如影随行的源自中华母国的中华文化,也在与移入地本土异文化的互动中,程度不同地发育成为移民接纳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源流之一。

本文拟回溯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变异,剖析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的主要特点,就当下在中国国家汉办倡导下,影响迅速拓展的汉语国际推广行动,与海外华人为弘扬本族群文化而建立的面向华裔子女的文教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若干思考。

一、海外华人族群文化发展脉络

“海外华人族群文化”作为一个特定命题,意味着它已经从中华文化的母体脱胎而出,其虽然依旧秉承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但已有所变异,并在与所在国文化的交流与磨合中,各具特色。面对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而迅速升温的汉语国际推广热,有必要认真剖析不同国家华人族群文化的特

点,并以之作为制定相关政策之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中国人移居海外为时久远,但华人移民成为族群而引起当地国社会关注,则是相对晚近的事,并在不同国家经历了不同的演进过程。且以占海外华人总体80%以上的东南亚华人群为例。

在东南亚近代历史上,西方殖民者东来与大批中国移民下南洋,客观上促成了当时世界两大文明在东南亚的因缘际会。为谋生而南下南洋的千千万万华人移民先辈们,从踏上东南亚土地伊始,就处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直接制约与影响下,处于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行政制度的强制管理之下。随着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多,并在当地定居、繁衍,一方面,出于守望相助之需求,渐渐形成了具有相对封闭性的族群聚居点;另一方面,殖民当局始出于对华侨的猜忌与防范,也利用殖民强权将华侨限制居住于一定的小区之中,置于“甲必丹”等特殊管治机制之下。在如此历史条件下发育起来的华侨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民族生活方式存在互动,但基本上与当地主体社会保持距离,呈现出明显差别。华侨在适应新的生存条件的过程中,既在不期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项目(05JA840012)。

作者简介:李明欢,厦门大学人口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博导;黄猷,原福建社科院副院长。研究方向:华侨华人问题。

然中同时在器物与制度两个层次受到异文化的浸润,同时亦因与生俱来之中华文化母体的潜移默化,对异文化表现出一定的抗拒、排斥而基本自成一体。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对华侨贡献予以褒奖并吸收其人才,尤其是中国本土的抗日战争在东南亚激发起空前爱国热潮,促使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侨在政治上进一步认同中国。他们密切与中国的联系,接受中国的“侨民教育”,以复兴中华为己任,显示出“华侨社会”的显著特性。由是,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的突出特点,系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而在此背景下兴起的侨民教育,则具有强烈的族群自治性,并以延续中华文化之道德意识为主旨。近代至二战前在东南亚由当地华侨兴办的学校,几乎从经费、校舍到教师的聘任、课程的设置等,都由华侨社团或知名侨领自行筹办、管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新、马英国殖民当局曾经以提供政府津贴为诱饵,力图将当地华侨学校纳入殖民教育体系,但收效甚微。例如,1929年新加坡共有华侨学校204间,同意接受政府津贴的只有1间,到1934年,海峡殖民地共有华侨学校403间,接受津贴的也不过区区36间,不足十分之一。^[1]

然而,与此并行不悖的另一潮流,则显现于当地华侨社会的上层。作为华人族群中的“成功人士”或“专业人士”,他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已经越出了传统的“唐人街”,其教育子弟的趋向是将其送入当地的西语学校,乃至送其远赴欧美留学。以20世纪初的荷属东印度为例。

1907年,荷兰殖民当局出台了一项关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华人将可能取得“欧洲人地位”的新规定,根据该项规定,取得“欧洲人地位”的首要条件是“能讲荷语”,因此,“荷华学校”的开设,对于希望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华人家庭颇有吸引力。而且,根据规定,一旦获得了“欧洲人地位”,就“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可以更多地免除警察的压迫”,而其子女又“可以有更好的机会进入荷语学校”。^[2]在此政策影响下,时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共有近千名荷属东印度华裔学生进入荷兰各高等院校学习。^[3]

其时,由于华侨主体在经济上对于当地原住民的相对优势,使他们一般只满足于懂得一些原住民的语言,以应付日常生活与经营上的需要,却并不重视学习原住民的文字,无意深入了解其文化。反之,上层华侨家庭送子弟入西语学校则不同,虽然

原本也是出于便利与外国公司做生意、与殖民政府打交道的实用目的,但其中更包含有追求企业升级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意图,这种驱动力造就了一批不仅能适应外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与殖民政府的管治体制,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念的新一代华裔,西方文化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方法,也以他们为载体进入华侨社会,并慢慢扩散开来,不仅与中华文化共生,而且在碰撞中互相渗透与磨合。

东南亚华侨社会向华人族群文化的转型与二战后东南亚华侨社会政治认同的转向相伴而行。众所周知,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独立建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影响东南亚华侨社会转向的两大关键因素。新中国政府不主张双重国籍,主动鼓励华侨选择加入当地国籍,东南亚千万华侨在重大的政治变革中艰难适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在中国大陆十年文革中被无情切断,华侨产生了痛苦的被遗弃感。面对现实,绝大多数东南亚华侨入籍当地成为当地国国民。也正是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东南亚当地新兴民族国家在重新分配经济资源的过程中,与华侨的既有利益之间矛盾激化,冷战思维左右下的当地国政府视本国华侨华人与“红色中国”的天然血缘纽带为威胁,诸如此类的多重因素交错一体,形成一股强迫华侨全面同化于当地国的思潮及各种政策措施。在此大背景下,战前曾经兴盛一时的华侨教育受到干预、限制乃至被彻底查封。在一些国家,连华文文字、华文语言、华文姓名都被禁止使用。华文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成为具有危险信号的异类标识,甚至可能导致杀身之祸。

冷战时期中华母国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关系的阻隔,还反映在传统移民潮流的中止上,中国与东南亚传统移民大门的关闭,使得基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正式移居东南亚。战前那个依附于中华母国的“新客”群体,从政治入籍、认同转向到心理归属全面向“华人社会”或曰“华人族群”转化,在此期间成长的新生代华裔,在缺乏甚至敌视华文的氛围中成长,自身族群母语文化的缺失使大部分新生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所在国的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随着西方文化与当地文化同时加速对华人社会的多方位渗透,中华文化在传统华侨社会中曾经具有的至高无上的主流地位受到根本性的颠覆,海外华人文化与中国本土之中华文化母体分

离似乎已成定局。

冷战结束与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末中国本土之经济及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崛起,成为新时代影响东南亚华人群体文化发展之令人难以估量的重要因素。随着东南亚华人所受到的政治压力有所缓解,融入当地主体社会的条件有所改善,进一步引发了华人在文化上自我定位的要求。构建当地华人文化的问题因而被醒目地提了出来。东南亚华人群体文化在与不同国家文化的交融中日渐分化,印尼华族文化、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菲律宾华族文化、泰国华族文化各具特色。这一从传承中华文化到全面同化、再到构建独具特色之不同国家华人文化的转型,是目前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自觉趋向,虽然仍处于摸索与试误之中。

同期,在北美与欧洲,当地中国移民曾经长期遭受歧视,散布于从纽约、旧金山到伦敦、巴黎的“唐人街”,是华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艰难立足、惨淡谋生的写照。欧美早期唐人街的形成是华人在遭受种族歧视下为求生存而做出的适应性反应。欧美华人总体规模远不及东南亚,分散在不同国家更强势单薄,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体系及强大的工人工会组织的左右双向夹击,更使早期欧美华人承受着较之东南亚华人移民更为沉重的生存压力。然而,在欧美艰难谋生的中国移民,同样在异文化环境中熔炼着自己的族群文化。一方面,他们将原籍地文化搬到异域,建会馆堂口,组乡社团,与故乡在地域上的分割,但在情感与经济上与之相联,并从祖籍地文化中汲取生存、发展的原动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随主流经济起伏,文化上受主流社会制约,而且,当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主体时,主体民族的政治代表必然要求本国政治疆域之内的族群奉行同一道德标准,遵循同一游戏规则,也就是必须“求同”。因此,在与所在国社会其他族群相互磨合、适应、融化的过程中,华人群体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欧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海外中国移民及其后裔与主流社会之间在求同与存异之间的不断磨合,既是不同国家华人群体文化形成发展的动力,也在客观上促使海外华人群体文化从中华文化母体中脱胎而出。历经百年发展之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位在北美土地上成长的华裔、与在印尼、法国或澳大利亚成长的华裔之间的差异,肯定远甚于华裔与本国同龄人之间

的差异。

二、海外华人群体文化基本特点

早期海外华侨所传承的中华文化因素,主要是中国本土底层民间的“小文化”而非宫廷殿堂里的正统“大文化”,换言之,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他们人生信仰与追求并左右其言行举止的,不是中国本土传统中原士大夫精心塑造的邃密义理,而是升斗小民们在艰难谋生中形成的粗杂浅显的实用文化。因为,离乡背井、抛妻别子、谋生异邦的行为本身就带有对中华传统典型宗法制度的叛逆意识。早期华侨甫抵海外最初的社会组织,是一群独闯天下的单身汉在相对平等地位上自愿结合的自治性的生活共同体,他们以源自本土的乡缘、亲缘或多少以“会馆”盟约作为维系彼此的纽带,积聚起特殊的社会资本。此类团体虽然一般仍袭用宗法社会的外壳,但其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义”而非三纲五常;其道德标准是“豪杰”而非安分守己,如此社会文化对于传统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来说,已然是一种变异。

随着华侨在移入国定居立业,无论在东南亚或欧美,都开始出现华侨商人阶层。其时,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潮进入中国并风行一时,受此影响,初期华侨群体顽强进取、冒险犯难的集体意识被继承下来,并得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支撑,形成了具有充分谋略性的“商战”观念;而“抱团、排外”的思维定势,在东南亚与殖民者实行的专卖、包税、港主制度等相互结合,塑造了族群经济的封闭性与独占意识,在欧美则是为了在主体国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打压下,奋力在缝隙中求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由商会主导的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黄金时代,这样一种商业文化也就成为华侨各阶层共同的社会意识。随后由中国南来知识分子有意传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和社会民主思潮,都无法动摇这种商业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只能对青年学生与职工组织发生一定的影响。海外华侨的商业文化鼓励自由竞争与自主创业,但又使华侨经济长期局限于家族经济的模式,使华侨商人满足于以其对原住民经济的优势取得作为中介商的地位,却未能自觉走向与当地原住民相结合发展当地民族经济的道路。同时,由于强大的殖民宗主国资本的垄断,华侨商人也难以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东南亚华侨企业的现代化进程长期受到限制。

可以说,东南亚华侨企业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东南亚各国,虽然真正成为殖民者御用工具的华人并不多,通过此道而得以被纳入殖民体系并大富大贵者更少,但是,由于华人处于殖民统治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作为代理人而首当其冲,因此,殖民者基于自身利益偏好所做的选择,导致当地民众形成了“华人乃殖民同伙”的刻板印象。东南亚独立后尤其是民族主义高涨之际,基于族群基础而建构的此类社会刻板印象的延伸与扩散,就成为排华事件此伏彼起的潜在动因。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获得独立,建立了资产阶级当政的民族主义政权,推动当地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在政府原住民优先的经济政策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原住民经济逐步取得了可以与华人经济竞争的地位。华人则利用了原有的优势,在宗主国垄断性的大企业集团解体或撤退时抢占先机,急剧扩展,续后又在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与亚洲新兴工业群体对当地的两次产业转移中成为其主要的合作对象,率先参预了企业的国际一体化;因而出现了一批由华人主导的大企业集团,在当地经济活动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华人企业集团在资本结构上仍属于华人社会,在管理体制上大多仍摆脱不了家族企业的架构,在经营方针上仍习惯于追求垄断性的超额利润,不能或不愿接受平等竞争与平均利润,因此,长期以来当地社会一直对华人企业滋生矛盾复杂的心态:既对其获取神速增长的超凡能力刮目相看,又对其与生俱来的族群性心存疑窦,而且,一有风吹草动,族群性即成为某些当权人士转移矛盾的现成借口。

纵然如此,就这些华人企业的实质而言,因为他们既在经济上扎根于当地社会,又在经营上与当地的社会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们已经逐步从传统的华人社会游离出去,客观上已经进入了当地民族经济的主流。作为当地国社会上层权贵的有机构成,他们与原住民社会主体的劳工群的关系是劳资之间的博弈,他们与华人社会下层虽然有族群上的同一性,但也同样存在着社会阶层上的差异与阻隔。

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使用英语等西方语言的能力;在企业经营上,则由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增加了与国际市场的联

系,更多的接触了西方的企业与社会文化,并受其价值观的影响。当政治认同转向当地国时,他们对当地文化也不排斥,长期耳濡目染加之与祖籍国在地理上的隔离,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当地社会文化的熏陶,并在行为举止间表露无遗。马来西亚华人兴办的独立中学,是海外华人社会独立坚持华文教育的典型。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如此,其伴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也出现内部分化,“独中”内部的主体虽然是以华文为主的普通班,但还设立重视英语教育和政府考试的所谓“优秀班”、“精英班”等,其潜在动因是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学习年限,搭建中产阶级华人子女留学外国的“跳板”。^[4]

在欧美,战后初期的华人经济相对于主体经济微不足道,一是人口比例微乎其微,二是主要局限于菜刀、裁缝刀、理发刀等所谓“三刀”行业。主流社会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挟持了战后在当地成长的华人移民新一代。在老一代中国移民眼里,下一代是“香蕉人”,是“鬼仔”、“鬼妹”,^[5]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势不两立,使得他们对于祖籍国的想象罩上几多政治阴霾,对中华文化更是疏远陌生。

欧美华人群体从构成到实力的根本转变,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数百万新移民进入欧美,其基本构成迥异于战前的移民群。在他们当中,既包括数十万从留学向移民转变的知识阶层,^[6]也包括大量普通劳动者,近年来更增加了一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投资移民”和从事跨境贸易的商人。他们活跃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中外跨境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

海外华人社会因循历史发展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是有选择性的。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历史环境中华侨自身的素质与客观生存条件,使他们的选择只能在生活磨练、在与客观环境的调适中渐渐形成。当前华人社会自觉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其对中华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其对当地社会各种文化因素的态度取舍,更明显地展示为理性选择,这就是:既符合于当地国现代化的需要,也符合于华人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这是一个基本取得共识的选择标准。

三、海外华人群体文化、华文教育与汉语国际推广

海外华人群体文化生态决定了其对华文教育

的需求,对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生态发展趋向与特点的了解,应当是我们开展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前提。

我们曾经在2005至2006年期间对前来厦门大学学习的海外华裔留学生的不同群体做过多次问卷调查与数十例面对面访谈,^[7]通过调查所展示的东南亚华裔青少年的政治、文化、族群认同与追求,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就国家认同而言。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青少年在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已成定势。在我们进行的访谈中,被访的海外华裔留学生时常会很自然地使用“我们菲律宾如何如何”或“我们印尼如何如何”之类的表述。在我们调查进行过程中,适逢泰国公主来访,当泰国华裔学生得知能安排其觐见公主时的雀跃欢呼,当他们觐见公主时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由衷崇敬,当他们觐见公主后主动聚会庆祝并向家人报喜的激动之情,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东南亚华裔,他们是立足于东南亚而向中国延伸的民间纽带。作者之一李明欢曾经多年担任厦门大学美国留学生班关于中国社会文化课的主讲教授,直接感受到美国班上的华裔学生除了外貌上的差别外,在国家认同上与其他美国学生基本相似。

其次,就文化习俗而言。在海外出生成长的华裔年青一代,大多在当地学校接受国民教育,他们对当地的社会生活不仅不再感到隔膜,更不排斥,而且,大多数华裔青少年已自然而然地将当地国的语言作为自己的第一语言,倒是对华文、华语(尤其是普通话)相对陌生。虽然来自不同国家的华裔留学生在对华文的陌生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在社会交流中以当地国语言为主要手段的趋势显而易见。我们对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显示,约82%的被访者在家中与父母主要用印尼语交谈,92%在与朋友交谈时主要使用印尼语。^[8]菲律宾的情况有些不同,菲律宾华人大多祖籍闽南,长期有“只要会讲闽南语就能在菲律宾通行无阻”的说法,迄今大部分华人家庭仍然保留以闽南语交流的习惯,但我们的调查亦显示,改用菲律宾本土的他加禄语为家庭中主要交流语言的比例已达约20%。^[9]在荷兰的调查显示,大约37.2%的家长认为自己在当地出生成长的孩子有“鬼性”,即行为举止已经当地化了。^[10]

再者,就族群意识而言。在总体上,海外华裔仍然保持着对自己族群历史的集体记忆与认同感,保

持着自己的族群意识。他们在政治上认同于当地国,具有明确的所在国公民意识,但又不能不对当地国曾经发生过的对华人的歧视以至迫害,印象深刻,痛心疾首。因此,他们致力于争取与其他族群的平等地位,希望保持自己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建构植根于当地的华人文化来维系族群的内在联系,因应族群的共同利益需求。如果说,在冷战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曾经存在的趋向是被动地融入当地社会,是谋求适应强势的西方文化,当前的趋势则另有不同,这是一次主动的谋划,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反省自身所承袭的中华文化因素,是理性地审视、清理与整合已经在华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与发挥作用的多种文化因素的文化自觉。

面对海外华人族群在政治上已经认同于当地国,在文化上已经深受当地国熏陶的现实,如何因应其需求而开展华文教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人强调,华人既是当地公民,应该着重于接受、传承当地文化,如果提倡保持与继续吸纳中华文化,将会影响华人的当地化,固化乃至扩大族群之间的鸿沟。相反,亦有人认为,华人生活在当地,无时无地不在吸收当地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仅是着眼于保持族群文化特质的必要的安排。还有人指出,中华文化作为华人文化的一个源,也是当地文化的一种组成因素,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此外,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有人将海外华裔学习华语、华文,吸收中华文化因素的意义,直接锁定在发展当地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意义上,认为这于华人、于当地国家都有现实的意义。相反有人质疑:这只是将华语、华文以至中华文化作为一种工具语言看待,就如学习一种外国语言、理解其文化背景一样,与为构建华人文化而吸纳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两码事。再有人认为,学习华语、华文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基本条件,而且在语言与文化知识的学习中就会接受其价值观念的濡染;而且当地懂华语、华文的人多了,社会生活中就会出现中华文化的氛围,这对构建华人文化有利无弊。

目前由中国国家汉办直接主导的汉语国际推广活动,虽然其所面对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华裔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华人族群在这一推广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性,汉语国际推广活动无疑应当全面考量当地华人的族群意识和族群文化,以及他们对于实施华文教育的现实期待。不论是设想以构建当地的华人文化来保持族群

的特质,维系族群的内在联系,支持族群争取平等地位与共同利益,或是以学习华语、华文,熟悉中华文化背景来为华人的经济活动服务,二者都是以实用目的为主,因而带有急功近利的倾向。

我们认为:一种文化的成型,是长期积累、磨合的结果,有意识的倡导与努力,本身就是一种试误与证误的过程,难望在短期内达到预期的成效。海外华人觉悟到要有自己的族群文化,既不是被动的当地化或西方化,也不是单纯的移植中华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要推动这项事业,只能从清理自己身上的中华文化因素,根据当地现代化的要求与族群生存发展的需要,加以重组;同时在这个基础上理顺与原住民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需要不断总结,决不可指望其毕其功于一役。还应该看到,华人社会在不断多元化,建构华人文化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要求,而中产阶级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华人文化对于不同的群体只能是求同存异。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要从中华文化中索取什么,只能由实践来决定。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将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领域,是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批判精神,而决不仅仅是古老中国以孝治天下所要求的伦理道德。

目前正在向世界各地全面拓展的汉语国际推广活动,必须将海外华人族群文化的现状考虑在内。随着中国对国际社会与国际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以全面促进汉语国际推广、弘扬中华文化来发展软实力是一回事,支持海外华人文化从中华文化的母胎脱体而出、成为当地社会的族群文化又是另一回事。如以前者来取代后者,就会混淆华人学习母语与学习一种外国语的界线,混淆配合海外华人构建自己的族群文化与弘扬中华文化的界线,对维护与发展华人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是不利的。中国能够给予的,是可供借鉴的人文内涵,是中华语言文字的内在规律及运用,而海外华人自身则需要实践中寻找自己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办学方式。两者在相互理解前提下的有机互动与交融,方能更有利于当前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推广活动的顺利发展。

注释:

[1]《星洲十年》,转引自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05页。

[2]详见廖建裕[列奥·苏里亚迪纳达]著,李学民、陈

巽华译,周南京校:《爪哇土生华人政治》,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第14-27页。

[3]参阅李明欢著:《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出版。

[4]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0年4月13日。转引自石川贤作:《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和华人社会的阶层结构》,《南洋资料译丛》2002年第2期。

[5]欧美国家华人移民中广东方言群对那些不会说中文、对中国不了解的华裔青少年的习惯用语。

[6]根据中国教育部网站正式公布的统计数据,自1978年到2006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106.72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27.53万人。目前仍在国外的79.19万留学人员中,有58.33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学术访问等(<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63/info1226296711722263.htm>)。据此统计,大约有20.86万人已经从“留学”转为“移民”身份。由于出国留学生的家属大多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知识移民的总数应当远高于此。

[7]本项调研是由李明欢主持的教育部社科研究基金项目(05JA840012)的组成部分,部分成果已经发表于《海外华文教育》2006年第3期“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留学生专题研究报告”。

[8]以下是我们于2006年对128名在厦门大学学习的印尼华裔留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印尼华裔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语言

	与父母交谈		与朋友交谈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印尼语	93	81.6	116	92.1
英语	1	0.9	1	0.8
普通话	6	5.3	2	1.6
闽南话	9	7.9	3	2.4
粤语	1	0.9	1	0.8
客家话	3	2.6	0	0
其他	1	0.9	3	2.3
总计	114	100.1	126	100.0
缺失	14		2	
总计	128		128	

[9]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调查是在来厦华裔留学生中进行的,而且,调查群体之一的“菲律宾华裔青少年进修团”系由菲律宾华裔、华校及华人社团共同组织,因此,这些被调查对象的家庭一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较高,其家中使用汉语方言的比例一定比较高。可以想象,那些业已完全当地化的华裔家庭,送子女来华学习的比例相对会比较低。

[10]详见李明欢:《从〈半月报〉载文看荷兰华人心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福建 厦门 361005;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责任编辑:张燕清)